

中俄当代女性家族小说寻根建构之比较

——以《纪实与虚构》与《雅科夫的梯子》为例

张 蕾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在当代中俄文坛,很多女性作家将目光投向家庭领域,创作出一系列家族小说。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与乌利茨卡娅的《雅科夫的梯子》分别是中俄家族小说寻根创作的典范之作。通过对两部长篇小说在寻根动机、寻根策略以及寻根结局等方面的比较,能够揭示出中俄两国作家在进行家族寻根时的不同关注点,更好地阐明中俄两国家族小说创作所蕴含的异同,揭示中俄家族小说各自的叙事特色及要达到的寻根目的。

关键词:王安忆;乌利茨卡娅;寻根小说;《纪实与虚构》;《雅科夫的梯子》

中图分类号:I512.074;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2)03-0076-06

一、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俄罗斯女性作家在文坛的集中崛起俨然成为一个显著的文学现象,“一大批女作家异军突起,堪与男性同行比肩,占据了真正意义的半壁江山”^[1]。与此同时,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将目光投向家庭领域,出现了很多家族小说,如乌利茨卡娅的《雅科夫的梯子》、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记忆记忆》、季娜·鲁宾娜的《俄罗斯金丝雀》等。无独有偶,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女性作家创作亦呈井喷之势,正如任一鸣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从复苏走向了繁荣,呈现出‘春水’般涌动的赫赫声势与‘繁星’般灿烂的熠熠光彩,一时间形成了一支‘四世同堂’的女作家队伍,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势头之猛,是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的”^[2]。她们中同样有很多将目光转向家庭,创作出诸如《纪实与虚构》《我们家族的女人》《无字》《羽蛇》等家族小说。

在上述列举的诸多作品中,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与乌利茨卡娅的家庭纪事小说《雅科夫的梯子》尤为值得关注,两部作品是中俄两国家族寻根小说的代表作。两位作家均以小说创作见长,所生

活的年代相近且至今仍健在于世。两部作品均致力于对家族历史的追根溯源,同时又都采用交叉型叙事手法,在内容和创作手法上较为趋近。但是两位作家进行家族寻根的方式有所不同,目前学界尚无相关比较研究,因而值得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挖掘。通过对两部作品在寻根动机、寻根策略以及寻根的最终结局等方面进行比较,能够阐明在相近时期中俄两国家族寻根小说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对两国的家族文学创作特点获得深入认知。

二、寻根动机的异同

《纪实与虚构》与《雅科夫的梯子》均致力于对家族史的追根溯源,且都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纪实与虚构》“叙述了一个备受煎熬的女作家以‘自己’‘母亲’‘家史’的困惑为起点,逐步追踪、凭虚构出一部家史的过程”^[3]。王安忆认为,“家族小说……是一种寻求根源的具体化、个人化的表现,它是‘寻根’从外走向内的表现”^[4]。因此,该小说满足了作家内心深处“寻根”的主观性需求。乌利茨卡娅在《雅科夫的梯子》(中译本)“致读者”部分指出,她这本书是献给祖父的,其中有很大部分反映了她自己的家族史。作家在小说中对祖父等老一辈的历史进行追根溯源,挖掘

收稿日期:2021-10-26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俄罗斯女性家族小说历史书写研究”(项目编号:SK2021A0044)

作者简介:张 蕾(1993—),女,安徽合肥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出很多老一辈人身上的诸多美好精神品质。由此可见，两位作家都在创作中融入诸多真实素材，试图以此构建出一部家族史。但仔细研读两部作品会发现，两位作家寻根的动机又各有千秋。

《纪实与虚构》中的叙事主人公“我”试图找到自己母系家族的源头所在，其动机正是她内心无尽的孤独感，因为“没有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恹恹惶惶，我们生命的一头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另一头隐在迷雾中”^[4]⁴⁹。小说中处处透露出主人公内心强烈的孤独感。从时间上看，主人公对自己的过去倍感迷茫，她母亲家是一个溃败的家族，父亲又来自遥远的地方，根本无从知晓父系家族的过去。虽然母系家族的过往经历依稀可寻，但母亲自记事以来便过着孤儿般的生活，跟着外祖母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后来外祖母过世后，她被送进孤儿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儿。因此，叙事主人公对家族过往难寻踪迹，只能从母亲口中得知些一鳞半爪的碎片，而母亲对血缘代际之事讳莫如深。因此，无论“我”做怎样的反抗，都只是在不断地加深这种孤独感。从空间上看，“我”的父母都是从外地迁入上海，是这座城市的“外来户”，坚守着革命“同志”所惯有的朴素生活方式。一家人对上海这座城市都没有太多归属感，甚至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难以融入充满俗气的“小市民”巷弄生活。总之，这种由时空断裂所造成的孤独感是叙事主人公“我”进行家族寻根的主要原因，借此反映出王安忆对自己家族寻根的强烈渴望。

再来考察小说《雅科夫的梯子》，与王安忆不同，乌利茨卡娅进行家族寻根的创作动机显得更为迫切和实际，要知道作家在完成这部作品时已年届75岁高龄，该小说也成为她真正意义上的“封笔之作”。实际上，乌利茨卡娅早在2011年完成长篇小说《绿帐》之际便打算歇笔，不想再从事耗费巨大精力的长篇小说创作，但一个偶然的发现改变了她的想法。作家曾在一次采访中提起这一发现，“2011年我打开了一份厚厚的文件夹，自祖母过世后，这一文件夹便一直存放于此，距今已年代久远。我在里面发现祖父与祖母之间持续多年的书信往来，大约有500封，始于1911年，持续多年。读这些信件令我倍感恐惧，有种骨架从书橱上掉落下来的感觉。这是默默无言的先辈们带来的恐惧……我知道，在我去世过后，孩子们会将这些信件随意丢进垃圾桶。而这又是一种恐惧，一种

遗忘的恐惧，当下的国家正患上这种遗忘的病症”^[5]。由此可见，乌利茨卡娅深刻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神圣使命，即让家族中的后代知晓家族历史，了解祖辈曾度过的艰难岁月。因此，作家将信件中的一些真实内容注入小说中，追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家族史，对老一辈人，尤其是雅科夫生活经历的叙述是其家族寻根的重要基础，从中了解到家族先辈在过去历史岁月中历经磨难却奋斗不息的往事，以此激励当代人。

由此可见，在寻根动机层面，两位作家都希望能够追踪家族过往，了解祖辈曾经历的重大事件，以此为家族史的书写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但《纪实与虚构》所凸显的寻根主观意愿更为强烈，叙事主人公“我”被内心强烈的孤独感所推动而进行家族寻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自己在现实中“无根”的空虚与尴尬，以此缓解漫无边际的孤独。乌利茨卡娅在《雅科夫的梯子》中创设的家族寻根情节更具客观性，主要是外界因素所致，即主人公将无意中发现的祖先的真实信件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后人领略到家族祖先虽身陷重围却依然奋勇前进的精神追求，以此对抗正逐步消失的记忆。尽管如此，从《雅科夫的梯子》的字里行间，仍然能看出作家对家族的高度重视。实际上，乌利茨卡娅的很多家庭纪事作品都对家族根源进行了详细追溯，书写了老一辈人的人生经历，历经坎坷仍砥砺前行。正如俄罗斯学者拉莉耶娃指出的，“对乌利茨卡娅而言，家族观念最重要的标志——并非横向关系，而是纵向关系，即代代辈辈之间所固有的联系，祖先和历史根源的记忆。”^[6]作家之所以对老一辈人如此关注是被他们身上崇高的精神品质深深吸引。

三、寻根策略的异同

《纪实与虚构》与《雅科夫的梯子》两部长篇小说都具有家族寻根特色。虽然两位作家寻根的动机各有千秋，写作目的与意图相异，但是，所使用的寻根策略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这首先最直观地体现在两位作家所使用的叙事策略上。

（一）叙事策略的运用

《纪实与虚构》与《雅科夫的梯子》在叙事层面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两位作家均采用双线交叉的叙事结构，即在小说文本中构建出两条相互平行的情节线索，并且互相补充、并行不悖。在《纪实与虚构》中，两条叙事线索分别由横向的“现实性”叙事与纵向的“历

时性”叙事构成。小说的奇数章进行“现实性”叙事，主要讲述主人公“我”从小在上海这座城市成长和生活的经历，抒发了自己在城市境遇中生存的孤独感，呈现了与庸俗的巷弄生活格格不入的生存状态，叙事时间距当下较近。小说的偶数章不断向前追溯，探寻了整个母系家族的源头，即从母亲的“茹”姓一路向上追溯一千多年，以柔然部落的起源、发展、兴盛直至最后的衰落进行历时性讲述。最终，家族祖先由曾经辽阔无际的大草原迁移至江南小城，在家族彻底破败后，又举家迁往上海。正是在这种交叉叙事性结构中，作家实现了对家族历史的书写，最终形成家族神话。

无独有偶，在《雅科夫的梯子》中，乌利茨卡娅同样采用两条时间线索之轴，一是通过现实时间中娜拉的现代生活之维，二是透过雅科夫与妻子玛利亚的书信所展开的历史时间之维。第一条线索主要以雅科夫的孙女——娜拉的情感生活与工作经历为基础，包括她儿子尤利克的成长经历，时间逐渐过渡到当代，展现了当代生活背景与主人公的命运；第二条线索则主要沿着历史的发展轨迹，由雅科夫与妻子持续多年的书信及其个人档案构成，向世人展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幸遭遇与艰难命运。

由此认识到，两位作家都不谋而合地选取交叉型叙事手法，将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两个时代的人物及其各自的生活场景在小说中交替呈现，历史经历与现实生活贯通融合、交相辉映。两条线索并无主次之分，它们相互交织、交替呈现，犹如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平行对话。这种叙事结构让人耳目一新，令读者获得全新的阅读体验。由于两部作品都具有相当浓厚的自传色彩，因此，“现实性”时间直接介入作家自己生活和成长的年代，时间距当下较近，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而在历史时间之维，两位作家都将叙事时间不断向前延伸，读者在其中能够领略过去某一时期的时代氛围、生活境遇。这种“两相结合，既有‘现时性’叙事的切身之感，又有‘历时性’叙事的参与感与超脱感”^[7]。

在叙事人称和视角层面，两位作家为突出各自的创作主题，在选择叙事手段时各具特色。叙事视角问题是小说叙事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叙事视角在小说中的成功运用能够为文本增色不少。叙事视角的运用体现了作家想呈现给读者作品中所叙述的这个

世界的样子。与此同时，叙事视角又与叙事人称联系紧密，叙事视角的特征通常由叙事人称决定。叙事人称通常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则有全知和限知之分。全知视角也被称作“上帝视角”，叙事人在其中无所不知，不受拘束，有着开阔的视野，能够通过精心地构造把情节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但是，全知视角如果用之“过度”，往往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如使故事的讲述变得枯燥无味，难以让读者拥有审美想象的空间等。有限视角则指叙事人的目光有限，其与不同人称连用时体现了作者不同的审美取向。此外，在小说创作中，还经常会出现叙事视角的交替使用，以弥补单一视角的不足。

《纪实与虚构》与《雅科夫的梯子》虽然拥有相似的交叉叙事结构，但在叙事人称和视角的选取上，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纪实与虚构》的奇数章中，王安忆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全知视角审视“我”从小在上海这座城市的琐碎生活经历。全知视角使叙事人能够详细地讲述“我”与邻里同学之间的相处状况，包括后来结婚生子这些人生大事，还有作为“外来户”在上海的异常孤独感以及最终寻找到对抗孤独的方法等。这部分内容因具有一定自传色彩，十分贴近现实，因而显得真实可感，读者能够切实感受到“我”所生活的那一年代的时代氛围。第一人称全知视角因从“我”的视角出发，同时视野开阔，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极力展现“我”的内心世界，叙事人能够尽情展露内心独白或进行议论。“我”因此得以将内心的所感所想全盘托出，如此更加强烈地渲染了身处上海这座城市的无尽孤独感。在偶数章部分，作家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自己母系家族的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历程，借此为自己的寻根服务。第三人称使作家能够更客观地进行历史的讲述，与此同时，在全知视角下，才能更好地进行虚构。作家对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过的柔然国所发生的诸多故事加以虚构，详细讲述了自己家族中的柔然祖先从建功立业到逐渐衰落的恢宏历史。由此可见，全知视角在小说叙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统领着整部小说的发展。

而在《雅科夫的梯子》中，两条线索的讲述采用了不同的叙事人称。作家在娜拉生活为主线的现当代生活部分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作为全知的叙述者，从故事中抽身出来，并同时既以观察者、感知者身份出现，也是叙述者，可以预知未来，可以看透人

心”^[8]，叙事人借这一视角向我们讲述了娜拉的个人生活以及她儿子尤利克的成长经历。乌利茨卡娅之所以采用第三人称，而非第一人称，是因为她与王安忆的想法有所不同。从《纪实与虚构》的序言部分不难看出，王安忆完全将这部小说当成是自己生活经历的折射，而乌利茨卡娅并非如此，“有人把《雅科夫的梯子》称作一部女作家的自传体小说，但乌利茨卡娅并不认账，认为它只是一部叙述小说，与此同时，她也坦承在女主人公身上注入了自己的思想和感受”^[9]。乌利茨卡娅否认了小说的自传性，这可能是出于自我隐私保护的原因。当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事时，作家本人会与所叙述事件之间拉开一段距离，代入感不像第一人称那样强烈，读者很难将小说的叙事内容与作家本人的经历直接联系起来。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生活图景部分的地理空间跨度大，从俄罗斯跨越到美国、格鲁吉亚等，只有全知视角才能更好地驾驭和把握这种任意时空的叙事，展现现代社会万花筒般五光十色的生活场景。

在《雅科夫的梯子》的历史线索部分，多种人称视角混合使用，体现了乌利茨卡娅娴熟的创作技巧。在对雅科夫与妻子玛利亚较久远的家族背景及雅科夫的流放生活进行介绍时，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其距当下较远，需以全知视角的形式才能全面把握，第三人称又赋予叙事以一定的客观性，使读者更加信服。同时，作家又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将雅科夫的日记、信件（包括与玛利亚的通信）和记事本等内容直接呈现给我们，这里的视角是雅科夫本人的，因而而是有限的。第一人称叙述是一种“进行时”状态，即使这些日记和信件的内容距今已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但读者仍能近距离地加以感受，其给人以强烈的身临其境感。乌利茨卡娅借此将叙事的权利和自由交给雅科夫，让他尽情讲述自己在过去历史岁月中的种种经历，从而带领读者返回过去的历史岁月中，领略最真实的历史时代氛围。

（二）家族故事的杜撰方式

在《纪实与虚构》与《雅科夫的梯子》中，两位作家虽然都对过去的家族历史进行追溯，但她们向前追溯的时间相差久远。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向前追溯了一千多年，距今十分久远，所搜集的材料大部分是从史书上截取而来，作家“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翻看二十五史，从中寻找蛛丝马迹”^{[4]461}。这些相对客观

的史料内容似乎让家族源头的探寻显得有根有据，但王安忆实际上是将这些史书上边边角角的内容拼凑在一起，杜撰出自己想要的故事，因而必定有很多主观臆想的内容成分。“‘我’不管客观存在过什么，执意叙述一种自己想要的历史，‘我想’‘我认为’‘我选择’等字眼在小说中屡见不鲜”^{[3]54}。因此，虚构是作家最为重要的武器，最后所呈现的家族史实际上是“我”不断创造的结果，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与此同时，“我”在家族故事的杜撰过程中塑造了诸多英雄般的祖先，如木骨闾、社仑、状元茹菜等。这些英雄般的人物使“我”内心倍感荣耀，因为“写一部家族神话不可没有英雄。没有英雄做祖先，后代的我们如何建立骄傲之心”^{[4]81}，作家所虚构出的家族故事不仅填补了她内心的空虚，同时也使她倍感骄傲。因此，“我”在整个家族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并未陷入无尽的悲恸，而是不时沐浴在虚构想象的快意中，找到疗愈孤独的方法。

反观《雅科夫的梯子》，乌利茨卡娅在其中讲述的家族历史跨度显然没有《纪实与虚构》那样久远，作家仅向前追溯了一个世纪。然而，这一个多世纪的家族历史却让人倍感情真意切。作家在进行家族历史构建时运用了真实的家族档案材料，该小说的结尾处有明确说明，“这个故事使用了家庭档案的信件片段和雅科夫·乌利茨基案件卷宗的摘录”^[10]。家族档案的运用无疑增添了小说的真实性，“家族记忆的承载形式有很多种，但是当人们去追寻家族记忆时，毫无疑问地都会指向‘家族档案’，这主要是因为‘档案’本身就是一种固化的叙事载体，‘固化’易于流传，而‘叙事’则容易解读”^[11]。乌利茨卡娅巧妙地将很多自己家族中发生过的一些真实事件注入小说主人公奥谢茨基的家族史中，譬如，作家的祖父雅科夫·乌利茨基的名字与小说主人公雅科夫的完全相同，他们都有过被流放和在集中营生活的经历；作家的小儿子也曾因服兵役的问题去美国生活，与小说中娜拉儿子尤利克的生活经历十分相似。因此，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真实的家族档案成分，比《纪实与虚构》中“我”从史书中查找到的内容真实地多。

与此同时，乌利茨卡娅在小说历史线索部分所追溯的主要是娜拉的祖父雅科夫·奥谢茨基的人生经历。这是具体可感的祖先形象，与《纪实与虚构》中虚构的英雄人物形象相比更加鲜活具体，这是与娜拉曾

有过一面之缘的活生生的祖先,其原型正是作家的祖父,因而注入了一定的真实感。与王安忆不同,乌利茨卡娅书写先辈历史并非为光宗耀祖,而是内心的怀旧情绪使然,正如孙超指出的,“乌利茨卡娅对老一代人,特别是革命前一代人经常予以格外关注”^[12]。这些老一辈人通常在家族中德高望重,有着聪明睿智的头脑,同时其优秀的精神品质又为家族中的后人所瞻仰。雅科夫是道德文化修养极高之人,但生活在那一年代的知识分子必然要受到严重打击。雅科夫经历过战争,后又因政治事件无端牵连而两次被流放至偏远地区,还曾身陷囹圄,备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但即使在流放的艰苦环境中,雅科夫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他顽强的精神和巨大的勇气令人深感震撼。对于乌利茨卡娅而言,家族先辈曾走过的艰苦岁月刻骨铭心,他们身上所散发的耀眼光芒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因此,乌利茨卡娅在现有家族档案的基础上建构出祖辈的历史,饱含着不忘过去、传承祖辈精神的美好愿望。

四、寻根后的回归:殊途同归

《纪实与虚构》于 1993 年问世,《雅科夫的梯子》于 2015 年问世。两部作品虽然相隔二十多年时间,但都是在各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下所进行的创作。两位作家对家族历史的想象并未脱离当下的现实生活,而是通过历史作为现实背景,两者相互交织、并行不悖,让历史的线不断与现实相串联,从而形成一部无穷无尽的家族历史。在进行家族寻根之旅过后,《纪实与虚构》中的“我”为自己找到清晰的定位,不再是那个生活在大城市却时时倍感孤独之人。“‘我’努力创造自己与时间、空间的联结,不仅虚构了家族的历史,还虚构了自己的历史,为的就是通过纵向与横向关系的建构,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把自己平凡的生活编进远古英雄的浪漫史中”^{[3]54}。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杜撰出一个令自我满意的家族故事远比寻得家族历史的真相更为重要。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内心获得满足,这不仅是一种历史溯源,更是一种精神漫游。“我”的精神世界在历经一番探寻过后明显变得更加充实,获得了对抗孤独的强大力量。

《雅科夫的梯子》其实是乌利茨卡娅内心情感诉求的一种表达。苏联解体已有三十年时间,很多老一

辈作家不断回望苏联,乌利茨卡娅也不例外,正是怀旧的情绪使然。在后苏联时空中,经济发展低迷、社会道德沦丧、政治生活混乱等现实背景使俄罗斯人倍感焦虑迷茫,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身份的缺失。而“当传统归属于特定权威符号的身份认同机制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公众转而将目光投向以‘血缘’为基础的最为原始的身份认同要素——家族认同,关注家族意义上的‘身份’‘历史’‘记忆’”^{[11]29}。作家正是想借对过去家族历史的追溯实现身份认同,从昔日美好的家园中获得精神慰藉。最终,乌利茨卡娅在对雅科夫这一苏联时期老一辈人经历的叙述中,让当代俄罗斯读者更好地体验和感受到过去的历史时代氛围,同时也被这些老一辈人身上诸多的美好精神所触动。由此,当代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的历史记忆得以具象化,他们在回忆过去时不再空洞无味,而是有所依凭、有所寄托,从中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这也促使更多俄罗斯人不断追溯家族过往,从中获得奋发向上的正能量。

由此可见,王安忆与乌利茨卡娅家族寻根小说创作的最终旨归都是让人在精神上变得更加充实,获得慰藉,鼓励人们缅怀过去,珍惜当下生活并积极创造未来。只不过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更多是满足作家自己的个人精神需求,她从纵横两个层面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位置,弄清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摆脱了挥之不去的孤独感。而乌利茨卡娅的家族寻根创作的适用性更广,作家让更多当今社会中的俄罗斯人理解过去的历史,对老一辈人的精神获得深入认知,进而从俄罗斯的传统精神文化中获得诸多正能量,以此不断激励后人,从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五、结语

《纪实与虚构》与《雅科夫的梯子》分别是当代中俄家族小说寻根创作的典范代表作,王安忆与乌利茨卡娅在两部作品中均采用交叉叙事的结构方式,将过去的家族历史与当下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书写出代际交替的家族史。虽然两位作家在寻根动机方面有所异同,进而导致寻根策略亦有所异同,但是最终两位作家在寻根过后都走向了类似的结局,获得了异曲同工之妙,即希望依靠对过去家族历史的追溯慰藉当下人们孤独或受伤的心灵,能够从中获得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由此不断激励越来越多当今社会中的人能够以史为鉴,依凭现实从而展望未来。

参考文献：

- [1] 刘文飞. 俄语文学的性别变迁[N]. 文艺报, 2017-05-10(4).
- [2] 任一鸣.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9.
- [3] 吴婷琳. 孤独中的探寻: 解读王安忆《纪实与虚构》[J]. 语文建设, 2017(30): 53.
- [4] 王安忆. 纪实与虚构[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408.
- [5] Виктор Васильев, 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культура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истребляются»[EB/OL]. (2015-12-3)[2021-9-7]. <https://www.golosameriki.com/a/ulitskaya-interview/3084996.html>.
- [6] Лариева Э. В. Концепция семейственности и средства е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площения в прозе Л. Улицкой [D].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Автореф.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10.01.01, 2009: 6.
- [7] 吴迪. 论王安忆《纪实与虚构》的交叉叙事[J]. 明日风尚, 2020(17): 161.
- [8] 张嵘. 《雅科夫的梯子》中多重叙述视角与审美距离的关系探析[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4): 411.
- [9] 任光宣. 战胜对遗忘的恐惧: 俄罗斯作家乌利茨卡娅新作《雅科夫的梯子》评析[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16(1): 52.
- [10] 柳·乌利茨卡娅. 雅科夫的梯子[M]. 任光宣,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655.
- [11] 加小双. 当代身份认同中家族档案的价值[J]. 档案学通讯, 2015(3): 32.
- [12] 孙超. 当代俄罗斯文学视野下的乌利茨卡娅小说创作: 主题与诗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71.

Comparison of Root-seeking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Female Family Novels in China and Russia:

Taking *Documentary and Fiction* and *Yakov's Ladder* as Examples

ZHANG L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Russian literary circles, many female writers pay their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field and create a series of family novels. Wang Anyi's *Documentary and Fiction* and Ulitskaya's *Yakov's Ladder* are examples of Chinese and Russian family novels seeking root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novels in terms of root-seeking motivation, root-seeking strategy and root-seeking ending, it can reveal the different concerns of Chinese and Russian writers in family root seeking, better clarif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ontained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and Russian family novels, and reveal the respectiv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root seeking purpose of Chinese and Russian family novels.

Keywords: Wang Anyi; Ulitskaya; root-seeking novels; *Documentary and Fiction*; *Yakov's Ladder*

[责任编辑 夏强]